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福利、政府激励 与税收



*Welfare, Incentives,
and Taxation*

詹姆斯·A·莫里斯 (James A. Mirrlees) / 著
王俊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福利、政府激励 与税收

詹姆斯·A·莫里斯 (James A. Mirrlees) / 著
王俊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利、政府激励与税收/莫里斯著;王俊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2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4841-0

I. ①福… II. ①莫…②王… III. ①福利经济学—研究 IV. ①F0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1937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福利、政府激励与税收

詹姆斯·A·莫里斯 著

王 俊 译

Fuli, Zhengfu Jili yu Shuisho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4.7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58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前言

此卷书中收录的论文除一两篇外均为关于福利经济学的论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可被简明地阐述为：竞争性市场应被允许不受干预地运作，而政府的作用是维护法律的实施同时尽力消除垄断。这些论文包含了一种不同的观点。它们假设政府应该做有益的事情，同时尽力设计出应该如何明确地进行。市场可以发挥作用，同样各种税收也可以发挥作用。目标是引导人们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做出决策并将其付诸实施，就无须从数学角度分析每个人应该储蓄多少，分配给医疗保险多少，拥有几个孩子。如果我们都是绝对善良的，就无须研究人们需要以税收的形式付出多少才能维持给穷人的补贴金，维持警力的雇佣，保证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或去寻求减少我们给环境带来的灾害的方式。

如果福利经济学简单地告诉我们自由贸易是最好的，那将会是令人满意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无须建立一个好的经验模型，并详细说明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量的福利测量标准，而只为提供一个建议。有时这些笼统的原则确实会发挥作用。第五篇论文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如果在城镇里各自独立生产的产品都在规模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生产就能取得产品的最佳规模效应。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实行垄断的公司，在这样的环境下的垄断是良性的。令人遗憾的是，从福利经济学中能得到的结论很少会是如此全面和定性的。对于像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这样的



问题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直观的量化的答案，但是只有一个精确的量化的答案才是值得探究的。至少我们需要理解哪些现象和标准会决定这个答案，又是如何决定的。幸运的是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政府仍然在研究养老金的决定和养老金的分配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通常通过只决定分配而不决定养老金的方法来使继任政府的工作简单点儿。

经济学家们和很多其他人长久以来都认为在劳动收入上的边际税率不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因为把所有的收入增量都用税收征走会消除人们提供劳动的积极性。那是一个有趣的要点，但并不是最有意义的。真正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所得税率应该是多少。再一次的，这是一个定量的问题。一个定性的结论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实际上开展一场简单的争论是有害无益的：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声明百分之五十的税率过高，甚至百分之二十五的税率也和其应该有的税率一样高。很明显我们需要更精确的分析。本卷书的第六篇论文提供了这样一种分析，不可避免地只适用于一种很简单的模型。在第十一篇论文，第十篇，第十二篇和第十三篇论文中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其中包括更严格的试验。第十四篇论文力求将这些学术观点更直接地应用于现实的政策问题。

我们预期这个简单的模型是现实的。在经济学里，现实主义是很难真正取得或达到的。这意味着在经济学现实里最重要的特点就可以被理解成是有近似精确的量化的比例均衡，但是决定把什么作为其最重要的特点这个过程又是一个艰难的判断。在边际所得税那篇论文里的模型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特别是消费者们对于他们的未来没有不确定性。那个模型里的人们只在一个方面不同：每小时的工资率。现在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现实的特征。人们是不同的这个现实，在一定的真实程度上，在任何的经济学模型里都是一个基础的因素，但是它也是一个在过去的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模型里经常被遗忘的因素。当然如果我们将要研究所得税税制的话这是一个关键的要点，我认为时间界限并不是同等重要的。人们一生的劳动力供给毫无疑问是一个变量，人们一生对所有产品的消费也一直是一个类似的变量。接下来我们把观察到的一个国家曾经的工资收入的不平等作为模型里人们终生工资率不平等的现实的一个现实的数字。个人还会做其他什么呢？结果并不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形成可行的建议。它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人对于一个更现实的模型会得到的各类

结果。

建立一个有充足变量的现实的经济学模型是很难的。对那些描述论文中所使用的简单模型偏好的参量的现实评价标准的决定则更为困难。新泽西 (New Jersey) 的所得税实验表明, 对于在那个实验中的人们来说, 做出相对短期的劳动力供给决定, 则在劳动力供给和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相对较低, 并且由于人口的不同产生相当大的改变 (人口在简单的模型里是一个不易被重视的因素)。从事现实商业循环模型的经济学家们声称弹性事实上是很高的, 因为这些模型模拟了真实的经济记录。我相信这些实验更接近于事实, 虽然它们确实也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更高的个人工资的问题。很遗憾我没有在那篇论文里找到关于劳动力供给偏好和最优税率之间更直接的联系。由托马拉 (Tuomala) 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们所进行的经济研究工作进展良好。在我的论文里提到的税率相对较低, 并且在高收入阶层范围内多数情况下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接下来的计算则得出了更高的比率, 而我认为其是更现实规范的。

这篇论文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负责人/代理商问题提供了一种考虑解决措施的具体方法。这些所谓的问题是指人们想要计算出边际预算约束时所遇到的问题, 或是负责人希望强加给代理商的合同, 而双方都很清楚各自的偏好以及采取相应行动所带来的结果。负责人无法观察得出各个代理商的不同特征, 这就意味着预算约束必须因此而对所有人都是一致的, 就是这个所谓不对称的信息给了这个问题其特定的含义。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确定出最适宜的水平, 就是说在这个水平上它提供了最优性所需要的充足条件。在所有的负责人/代理商问题中, 人们都不可能只因具备必需的条件而得到满足。这就是标准的数学方法所能提供的, 但是它对于提出一个可能是最优水平的解决方法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必须能够证明其就是最优水平, 并且在那个水平上需要提供最充足的条件。在所得税问题中这种方法是令人满意的, 个人可以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找到这样的条件, 从而估计出最优水平。但不幸的是, 当人们达到更笼统的设置时, 这就意味着是更现实的, 例如说是含有超过一个无法观测的变量要素的模型, 那么获得充足的条件将更不直观, 难以计算。

自从那篇论文发表之后, 大量的新的结果已经被发现, 还有一些正



在被研究。我描述了四个结论。第一个，也是最声名狼藉的，就是在最高收入处（如果存在的话）所征收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的观点。我的论文只考虑了含有极大的工资分配率的模型，因此没有得出这样的结果。我认为那就是正确的策略。那个零税率的观点应该被表述为在有可能产生的最高收入上的边际税率应该是零。在任何具体的年份或者一个国家里，实际的最高产出都会大致比最高可能产出低很多，因此零税率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它也不是一个在最高可能产出上百分之十以下税率的精确估计值：托马拉的计算证明如此。我将继续讨论的第四个结论将会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

第二个结论是一个总体上令人满意的结论。阿特金森（Atkinson）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发现在一个多商品模型中，每个人对不同消费品的偏好相同，因而人群中无法观测的在于他们在劳动和消费之间大体的偏好。只需要对劳动供给征税就足以达到最优值，而不需要对消费品征税。这的确是很笼统的。当不能观察的特征是多维的时候，上述理论是有用的。同时在更一般的情形里，同样的原则表示，商品的哪些子集应该被课以同样的税率。消费品偏好可分离的假设确实是不太现实的，但结果是同样的结论可以应用于劳动力供给和商品偏好相互作用的模型中。我们还可看出当消费品很自然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劳动力的替代品时，应该对消费品征收更高的税。这就为以下的观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应该补贴教育和医疗事业，而对奢侈品和酒精饮品征税。但是我想要强调的重点是最优的消费品税通常不仅取决于所购买消费品的数量，也取决于收入。由于不同的信息渠道的原因，通常最优的消费品税并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想想最优税收体系将会有多么复杂。

第三个结论我还未曾发表。它重点研究了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即低收入者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被资助。所采用的模型和在探索论文中的模型一样。这里有一个不寻常的假设：假定效用是劳动力的递增函数，直到某一最高点，超过该点函数又递减。关于劳动力供给/消费偏好的其他研究都比较笼统，是以福利判断的形式存在的。结果很容易表述，就是说对于一定范围内的低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是百分之百。当工资率的分配（例如个体生产力的分配）在最低收入处不是过低时，这个结果就能成立。所有在实践中使用过的收入分配密度都满足这一假设。很多

实际的税收体系也有这一特征，当收入增长时补贴金就会同等减少，但是经济学家们普遍声称那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结果往往十分出人意料。

最后一个结论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关注的是劳动力供给弹性和最优税率之间的关系。人们似乎认为，至少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品之间的高的替代弹性将会需要一个较低的所得税率。别相信这个。考虑一个有一定数量的人群，人们的消费和劳动力供给是完全可替代的，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在有效率的单位内）有一个上限。注意到在整个可行的劳动力供给范围内，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并不是近似替代品。当个体效用是消费减去劳动供给后的凹函数时，令总体效用最大化，就能看出在最优预算约束处，消费是一个关于劳动所得的凹函数。大体上看，包括现实的工资分配后，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税率接近百分之百。

导致这个结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在消费—劳动力供给图中，无差异曲线都是直线（在零劳动力供给和上限之间）。由于激励相容，预算约束是所选择的一系列直线的下包络线，每一类消费者都有不同的一种，因此它是凹的，正像之前所阐述的那样。由于这些无差异曲线对于高工资率的人来说更加平坦，消费—收入曲线的斜率在高收入处变得更加平坦，直至趋于零。探索论文中的技术使为这个模型找出一个严格的解成为可能。

这个结论帮助人们认识到，当对可能的收入有一个上限存在时，那个边际税率在最高处应该是零的法则是多么的误导人。在这个极端的模型里，消费—收入曲线在最高的收入水平处将会有有一个拐点。这个结论同时也表明了从探索论文的计算结果和托马拉的书中的所得到的印象，即边际税率随着收入的增长应该减少（可能在某些较低的收入处除外），虽然它对某些现实的模型可能是对的，但它毫无疑问并不是一个通用的真理。

这卷书中的部分论文是关于委托人/代理人对于他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并不确定的代理者模型。解决这些道德风险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技术手段。第二篇论文包括了大量的近来不同的主题，向我们说明了像此类的适定的问题很明显地无法找到解决方法。典型地，当存在接近最优点的方法时，这类结果就会发生，而此最优点如果没有道德风险约束的话



就能达到。我们可以看到，在道德风险的模型之前，通过大量重复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使用累积的证据，也许能够接近最优点。我论文中所举的例子引起了代理人接近最优点的行为，而并没有二者相互作用的重复。它是通过对一些非常小概率的不同寻常的坏结果施加数额非常巨大的罚款来实现的。很明显那并不是实践中的一个恰当的契约，但是这种情况出现在那些虽然有点过分简单，但却现实且相关的模型中是有可能的，而这种可能性让人混乱。此卷书的第一篇论文中有关于什么是错的一些简要的讨论。

我们可以研究最优所得税模型的类似情况。在此模型中，消费者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类型和他们的工资率。人们做出劳动力供给的决定，比如职业的选择，但在某个阶段不知自己的薪酬。这里面有些是真实的：在所得税模型里，消费者对自己的努力对净收益的影响是完全确定的这一假设并不令人满意。范里安（Varian）考虑了这样一个模型。在对消费者效用函数以及对数正态分布的工资率的基本假设下，极端罚款问题就会精确地出现：最低的收入水平应该被征税，其他的收入也应该被重新分配以使边际效用相等。

因此不得不把消费者的不确定性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引入到所得税问题中来。可以假设部分劳动力供给的决定有不确定的后果，但是其他的（比如说何时退休，加多长时间的班等）则有完全可预知的效果。即使那样，把极端惩罚作为解决措施的问题还是不会消失，因为它是那种情况下最优的解决办法。它给代理商提供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纳税计划（在工作开始之前），并且根据数学方法计算，对于所有的这种可选择的纳税计划来说，采取极端罚款的形式都几乎是最优的选择。这就导致模型具有了更进一步的复杂性，也许会包含用若干变量描述的不同类型，而不是简单的技能变化。

随着模型沿着这些方向的继续发展，分析提出了更复杂的解决方法。人们可以被提供有各种契约的选择，这并非是不可想象的，它就可能发生在高级商务职位聘用期限的协商上，因此这类选择可以形成税制体系的部分内容。但是人们很难相信这样去做事实上就是真正最优的，特别是由于做出决定所需的花费，以及做出错误选择的成本。本书中没有一篇论文研究了下一步，即研究人们的决定会弄错的那类模型。建立

那种类型的现实模型将会更加困难。

第五部分的论文是关于最优增长的，它们同样面临着识别明显的适定问题的解决措施的问题，这些解决措施也许并不存在，或者是不能被简单地找到。例如，我在和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合作撰写那篇规模经济中的最优储蓄的论文时，结果发现我们最初相信是最优的并不是最优的。要获得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是一件棘手的事：我认为这些定理是有趣的，虽然它们很特殊。一旦我们离开了那些最简单的最优问题，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激励机制的兼容性，对于那些难懂的解决措施的探求往往需要特殊的技术手段，这才是更有趣的。不幸的是，做对比性的调研，或是要说明在最优处改变模型规模的影响，通常都是困难得多的。

这些论文对于我们形成一个关于委托—代理问题的一般理论——让我们区别出含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最优规模的模型的分界线的这样一种理论——并没有很大帮助。比如说，就像我们从关于道德风险理论的第十七篇论文中可以看到，在一系列可能的决定中把代理商放在一个无差异的位置上，而要求这一系列中只有一个是事实的选择，这种做法完全可能是最优的。这个产出结果可以通过设置一些轻微区别于正式的最优规模的激励机制来被近似地估计出来，这样代理人就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于代理商问题的一阶条件并没有充分描述委托人的约束。当研究一个关于养老金的模型时，我和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发现，使代理人对于几乎所有可能的决定认为无差异，将会是最优的结果（在这个问题里就是退休年龄）。第十七篇论文里谈到了主要的定理，给出了充分（但是高度限制）的条件来让一个道德风险问题显现出良好的行为，在那个意义上说，代理商的一阶条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激励兼容性的约束。这个定理带给了我很大的麻烦，导致了这篇论文直到罗杰斯（Rogerson）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证据后（很久以后）才出版。

确切地识别到底是一个模型的什么特征导致了这样的解决方案，这将会是很好的，而得到一些每个模型里找到的解决方案形式的一般原则将会是更普遍的。但是可能在独特的情况下多加注意将总是必要的，而且不能信任机械的程序。一个一般理论也许不可能存在。



参考书目

- Diamond, P. A. and Mirrlees, J. A. (1977). 'A model of social insurance with reti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0, pp. 295–336.
- Rogerson, W. (1985). 'The first order approach to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Econometrica*, vol. 53, pp. 1357–1368.
- Tuomala, M. (1990). *Optimal Income Tax and Redistrib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Varian, H. R. (1980).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s social insura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4, pp. 49–68.

詹姆斯·A·莫里斯

Welfare, Incentives and Taxation by James A. Mirrlees

Copyright © James A. Mirrlee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Welfare, Incentives and Taxa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福利、政府激励与税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2006 年首次出版英文版。中文译本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目 录

第一篇 福利经济学

第 1 章 信息和激励:胡萝卜加大棒的经济学	3
1. 看不见的手	3
2. 税收	5
3. 所得税制	7
4. 不对称信息	14
5. 道德风险	17
6. 普遍情况下不完全信息	20
第 2 章 关于福利经济学、信息以及不确定性的结论	25
1. 导言	25
2. 二次分配和风险应用	26
3. 家庭的描述	31
4. 消费者信息	37
附 录	38
第 3 章 对于自然资源损耗的渴求	42
给读者的建议	42
1. 资源以及世界动力学	43
2. 资源将会去往何方	52



3. 关于资源损耗的一些经济学看法	60
4. 经济政策	68
技术附录	70
第4章 效用主义的经济学应用	74
1. 二者择一的自我	77
2. 人与人之间的比较	80
3. 平等	84
4. 不同的个人	87
5. 公开的评价	89
6. 过程与结果	91
7. 总结	92
第5章 福利经济学和规模经济	105
1. 引言	105
2. 一个简单的案例	108
3. 土地的使用	112
4. 可变劳动力供给	117
5. 多产品且消费者群体相同	118
6. 多产品与不同消费者	123
7. 生产多种产品的城镇	126
附录:对于引理4和5的证明	129

第二篇 税收理论

第6章 最优所得税理论探究	133
1. 导言	133
2. 模型及问题的提出	135
3. 税收最优化的必要条件	137
4. 必要条件:完整的描述	140
5. 诠释	144
6. 附加证明	146
7. 解的特点	148
8. 例子	153
9. 数值实验	161

10. 结论	169
第 7 章 生产者税收	172
第 8 章 最优城镇	180
1. 导言	180
2. 最优条件	181
3. 人口的分配	185
4. 竞争性平衡	185
5. 财富的最优分配	187
6. 运输成本	190
7. 外部环境因素	191
8. 居住区	195
9. 最优化地理学	196
10. 需要注意的问题和结论	199
第 9 章 人口政策与关于家庭规模的税收	201
1. 人口问题	201
2. 一般的模型	203
3. 变化的环境	206
4. 偏好变化	207
5. 家庭规模的不确定性	210
6. 不确定条件下的自由式最优	214
7. 最大化的矛盾	217
结论	219
第 10 章 最优税收理论:综合推理	224
1. 简介	224
2. 线性条件下的最优税收	226
3. 最优非线性税收	229
4. 多重特征	235
5. 最适混合税收	238
6. 最优混合税收中的公共物品	244
7. 最适课税论的基本原则	246
附 录	248
第 11 章 最优税收理论	251
1. 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	251



2. 最大化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	254
3. 一次总付转移	261
4. 生产者和效率	268
5. 线性税收	272
6. 一维人口中的非线性税收	277
7. M-维人口	287
8. 消费者的不确定性	289
9. 计算和近似值	290
10. 结论	291
11. 文献说明	292
第 12 章 移民与最优所得税	297
1. 移民	297
2. 准则	298
3. 对外国收入不征税	300
4. 外国收入所得税：一般性考虑	304
5. 一个国外收入征税模型	307
6. 一个特殊例子	313
7. 结论	316
第 13 章 对不确定收入征税	318
1. 不确定的收入和不可预测的税收	318
2. 近似的最优税率	320
3. 所得税	322
5. 不确定性估计	326
6. 在收入衡量中的大偏差	327
7. 结论	328

第三篇 公共支出

第 14 章 有关公共支出的争论	333
1. 公共支出是否太高？	333
2. 最优所得税理论	335
3. 英国政府作为一个线性的税收体系	339
4. 历史纪录和一些最优状态	346
5. 结论	350